

中国经济·知识体系·学科发展

胡乐明 张晓晶 等

编者按：本文内容是根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全国高校，以及广东省政府等 21 位专家学者在经济所建所 90 周年国际研讨会 2019 年 5 月 17 日第四单元主题论坛“中国经济·知识体系·学科发展”上的发言编辑整理而成，该论坛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胡乐明研究员和张晓晶研究员主持。

马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深感学科体系建设是对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一个关键。三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共同任务就是抓学科建设。高校系统的双一流建设，其实就是围绕着学科建设展开的。中国社科院也把学科和人才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作为一个专门从事研究的学术机构，中国社科院和高校作为教学机构的学科定位有所不同，其中经济所就是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科建设的缩影。其有以下几个特点：学科历史悠久、门类齐全、基础雄厚、功能突出。中国社科院很多研究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之后，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关怀下也成立了一些研究所，比如文学所、宗教所，都是中央领导直接批示成立的。到 197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中国科学院分离出来以后，邓小平同志专门指示成立了几个新的学科，我们又迎来了中国社科院学科建设的又一个大的历史发展期。

目前，我院在国家标准的学科体系中，有一级学科 19 个，按照研究所建制的一级学科有 14 个。总的来讲，中国社科院可以称得上是六大学部门类齐全，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学科。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中国社科院的学科建设是根据我院的功能定位来设置的。根据中央的要求：一是要建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二是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三是建设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这几个定位决定了我们学科建设的基本框架和主要侧重点。

虽然现在抓学科建设是建立在对学科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但也有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首先，很多研究所建所以后，一些学科可能就比较定型了，很多研究室的建制存在学科设置过时的问题，跟不上时代需求。例如，在计划经济时代设立的应用型的研究室和应用型的学科，现在已经没有研究对象了，但是这样的研究室仍然存在。其次，很多研究室的设置过于专业，但是从学术或者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讲，过于专、深，这个问题比较典型。从智库定位出发，学科之间的壁垒又非常高，学科和学科之间的融通不够，在发挥智库功能的时候，大家往往只能讲一个片断性的问题，形不成一些综合的战略性观点。因此，我院在学科的组织机制上，有相应的需要改革的地方。再次，学科的平台支撑不足，包括硬平台和软平台。软平台的支撑就是所谓的支撑制度。硬平台包括学术期刊、学会、研究中心、网站和学术论坛。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学术平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学科长远的建设规划，各单位各行其是，怎么有效地对学科发展形成有效支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此，未来的规划是：首先，摸清家底，进行学科状况评估；其次，撤改并建，淘汰过时的，改名不符实的，合并力量分散的，建时代呼唤的学科；再次，夯实基础，包括软平台和硬平台，瞄准前沿，推出一批引领学科发展的学科和人才；最后，实现融合创新。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史,其实我们知道的很少。从现有研究来看,关于中国经济的知识缺失非常多。1949年以后,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讨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经济运行的研究不多。但是在西方,已经有了所谓非均衡理论,以及反均衡理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有很多人为了冷战的需要,开始了解前苏联经济,研究发表了大量关于前苏联经济的理论文章。我在20世纪90年代对这一类的文献特别感兴趣。

现在讨论中国经济70年历程,大部分研究都是针对改革开放以后的,计划经济那个时代的研究我们自己没有太多工作,像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讨论计划经济的《短缺经济学》反而对我国经济学家影响很大。战前的中国经济研究跟现在的经济研究也是割裂的,知识也是缺失的。现在的中国经济研究可能更多是讲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有一点点涉及计划经济,像吴敬琏先生写的中国经济的书,有些关于计划经济的介绍和描述,但是总体上还是不够。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邹至庄先生的《中国经济》中文版的出版对我影响很大,其中对中国计划经济的很多方面进行了很好的量化分析,让人大开眼界。

这样说来,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及之前的30年没有很好的实证研究,更没有对经济学理论做什么贡献。现在我们所研究的改革开放后的40年,如果放在更长的时间跨度里,也不过是一个阶段,计划经济也不过是一个阶段。但关键是,我们的知识不连续,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对中国经济的认识是有偏的。我们不知道过去是什么样,不知道在统计上有没有完整的数据。再往前推,如果推到鸦片战争之前,推到二百年前,我相信我们的知识就更少。中国大学里的中国经济课程也仅仅讲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形,很多事情好像是突然开始的,没有历史,这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特别是基于中国经验要进行的理论总结和创新有致命的伤害。讨论中国经济的知识体系,我们需要反思缺失掉的很多知识,要把这个工作补上,使年轻学生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关于中国经济的一套知识。

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从“中国经济·知识体系·学科发展”这三个关键词谈两个关联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和知识体系。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在哪里?我认为经济学的作用无外乎两方面:一是明道,提供理论指导和改革发展方向,也就是解决做什么、往哪个方向努力和改革取向的问题;二是优术,提供研究解决问题的科学规范和方法,也就是如何做、怎么做、怎样做才可能不断逼近最优,更好再更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只有向最好的学,跟最好的比,才有可能做得更好,再更好。

从明道方面,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都能发挥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导向作用,从而不应该将它们对立起来。在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总是有人肯定其中一个学科而反对另外一个学科,这都是有失偏颇的。我认为,由于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政治经济学在明道方面,在坚持党的领导,在坚持“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导向作用。

而现代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国策的明道方面,特别是市场化取向改革、经济全球化开放中,起到了最基本的理论指导和发展导向作用,同时也提供了大量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优术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学提供两类基本理论:一是提供明道的基准点、参照系及确立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基准经济理论;二是提供优术的更为贴近现实的实用经济理论。两者互为促进,且均可用于内在逻辑的推断和预测。特别强调和界定理论结论成立的边界条件,注重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在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六性”。基准理论和相对现实理论具有内在关联、相辅相成,不能人为地切割开来。对那些讨论理想状态情形下的基准理论,认为其不符合现实情况而一味否定,这无论是从方法论上还是解决好现实问题的角度来看,都是极大的误解。这

种先建立基准点和参照系,然后再发展出相对现实的理论以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方法,是一切自然科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我认为,基础理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与之相辅相成的相对现实的经济理论也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改革和良性发展就是要解决好“改革、发展、稳定、创新、治理”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旦目标和方向确定后,也就是做什么确定后,那些相对现实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如何做、怎么做的问题,更好地回答怎么样处理现实的约束条件,怎么样把一件事情办成的问题。比如,委托一代理理论试图解决微观、中观情形下信息、激励和效率的问题。而机制设计理论则研究从微观乃至整个更一般的经济环境下,如何进行制度设计或制度创新,改变不合理或激励扭曲的旧制度。

第二个问题,知识体系和学科发展。许多人在提到学科发展的时候,有一种偏向,甚至是偏见,就是以为我们所要发展的经济学只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国的急需问题。这当然特别重要。但我认为,在注重解决中国现实急需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重视对经济学科本身的世界性贡献,偏废其中任何一个都是不可取的。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评价体系由于认为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但不能直接套用或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那些“无用”的知识是无用的,从而忽视了中国对经济学科世界性贡献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恰恰是许多看起来一时无用的知识实际上说不定是非常有用的,如以市场化改革导向的那些基准理论就是这样的看来无用的理论,尽管它们是理想状态下才成立的理论,但具有极强的理论指导作用和如何发展的重要导向作用。因此,在经济学的学科评估和项目评审中,各个学校或学科对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和服务国家急需这两类导向应实行分类申报和分类评价,通过努力都有可能被评为一流,而不是将两者混为一谈。但现有的经济学科的评价指标体系,对经济研究的应用性和国家急需强调得比较多,而对经济学科本身的发展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度,基本上未被纳入到评价体系中,对世界一流的研究强调得还较少,且参与评价的权重过小。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经济人才的培养,还是科学研究,我们都必须做到经济理论、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三位一体。因为,我们要解决现实问题,必须要靠三个维度:一是理论逻辑,它异常重要,很多人提出的政策就没有什么逻辑,严重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二是要靠实践真知来解决现实和时代问题,但只有这两者还是远远不够,因为短期的政策应对和中长期的制度性安排往往是不一样的,所以还必须要有一个第三个维度,历史的视野,注重历史经验。所以,无论是学习、研究,还是解决现实问题,都必须是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的三位一体的方法论,这才是我认为是,无论是学习经济学,还是解决经济问题,都必需的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也可以对应到前面提到“六性”,即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科发展应该是平衡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真知灼见的、符合逻辑的、符合事实的、符合历史趋势的,能用数据检验、能为实践检验、能为历史检验的理论、工具及方法,对经济学科做出世界性贡献。

洪永森(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以资本和技术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有效提升了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特别是使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得到了有效利用,从而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包括以 G8 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均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不言而喻,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和标志是全球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这也使世界各国不可避免地结成了产业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我们可以通过全球价值链跨境生产份额的演化历程,回顾一下中国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当中成为“世界工厂”。在 2000 年的跨境生产网络中,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网络还处于分离状态,相互之间并没有联系。美国是亚太网络的核心,与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和澳大利亚联系紧密,并且通过韩国与日本相连,通过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相连。加入 WTO 之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的跨境生产份额很小。2005 年,